

休闲改变中国

四天工作制营造和谐社会

黄巧灵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总 序

《黄巧灵眼中的休闲世界》系列作品包括《休闲时代》、《休闲改变中国》、《休闲空间》、《世界主题公园》、《世界景观房产》等。本系列作品,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从休闲理论和休闲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的探索。这些作品有的侧重于理论探索,有的则从宏观和行业发展的层面进行思考,有的以图片的形式向读者和从事旅游休闲行业的专业人士介绍了世界环境艺术和休闲空间等。全系列有近百万文字、数千张图片,洋洋洒洒,蔚为壮观。《黄巧灵眼中的休闲世界》系列作品的出版将对中国的旅游休闲业和未来的休闲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为了持续发展,人类改变了过去拼命工作,不顾一切地开发自然的生活方式。人,需要休息,需要有节奏的工作;地,需要休耕,大自然需要养护。这都是我们面对新世纪所必须解决的、迫在眉睫的大问题。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实现了每周五日

工作制,并向“4 + 3”作息制过渡。如果加上退休后的一二十年,还有每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之余的一些休闲时光,人活一辈子,大概总有一半时间是在休闲。然而,过去却很少有人研究这些时光究竟应该如何度过。黄巧灵率先研究这一问题,显然具有重大意义。

认识巧灵还是在1986年,我担任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时候。那时他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一无所有,但却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有为青年。他当时发表的《阴阳五行与红楼梦》等红学论文,独辟蹊径、自成一说,已表现出独特的思辨能力。将近20年来,他看准了旅游休闲产业,先在海南,后在丽水、杭州,我亲眼见他跌倒、爬起来,经历了千辛万苦,不屈不挠,终于铸就了今天的伟业。

他不是个目光短浅、容易满足的人。当资金稍有积累,他就带领一些人到世界各地广泛学习,吸收先进的旅游休闲创意。1994年,我和他在曼谷的泰国皇宫不期而遇,他刚从欧洲回来,已经积累了数以万计的各种图片,脑子里满是壮志宏图。2001年,我们又在杭州相见时,他已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成功企业家。他领导的宋城集团开发项目已经从单一主题公园向多元化的大

型休闲社区和城市游憩产业区发展,从单一区域向跨区域整体延伸。他旗下的旅游休闲项目,涵盖了旅游休闲的全部要素。宋城集团已经成为中国旅游休闲业一块响亮的品牌。

巧灵与一般旅游休闲行业经营者不同,他不仅本身具有深厚的中国和世界文化素养,而且对旅游休闲事业有相当深刻的理论认识,因而也被社会上称作“儒商”。他的休闲系列作品不仅从国外先进的旅游休闲理念和实践中汲取营养,而且还从中国儒、道两家以至魏、晋、宋、明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出发,深入论证了人类文明至今,进一步开展旅游休闲事业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认为这是“第四产业”的创新和革命。他的最高理想是通过有品位的、优美的旅游休闲事业,不期然而然地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充分体现人文关怀。这是一项美好而有意义的事业,我相信巧灵和他的宋城集团将为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北京大学 乐黛云

大胆的设想 小心的求证

能为中国有远见卓识之人所写的如此重要的书写序,我深感荣幸。黄巧灵先生现在所从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休闲理论的研究和像休博园这样伟大的城市休闲项目的成功实践,对中国乃至世界休闲事业都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他的持续的努力,将帮助他成为中国休闲理论研究普及和休闲产业实践探索这两方面都做出突出贡献的第一人。

中国的休闲问题是黄巧灵先生思考和职业生涯的关键。此书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四天工作制这样一个重大的课题。他认为,实行四天工作制大力发展休闲产业,能有效破解中国目前面临的高失业率、高消耗、低效率和第三产业发展不均衡等一系列问题。

作为一个充满幻想的思想家和重要的企业家,他的工作和写作从根本上修整着中国休闲的前景。在他的书中,对于中国人生活的休闲前景提出了问题,同时又提出了回答问题的建议。关于中国如何评估自身的进步,他提出了最基本的问题。进步只能从经济的规模角度来评估吗?生活除了为挣钱而工作就没别的吗?“进步”只意味着经济发展吗?在这个日益显现的世界

里,黄先生正确地观察着,在城市范围内的休闲质量和为之供给的资源对于城市的经济福利和市民的幸福是十分关键的。劳动力和学生们被吸引到那些给人们一个富裕休闲生活允诺的地区,而不仅仅是一个工作的地方(我记得一个中国的大学生同我谈起去杭州的一所学校教书,她承认那是因为生活和休闲的质量吸引她的结果)。

黄巧灵解释了为什么生活质量的增加和休闲的机遇将提升经济和吸引更佳的人力资源。这些机遇也吸引着游客。这样的景象在其他地方也开始发展,例如,韩国的春川。在那里,城市规划者称他们首先想要创造一个“休闲城市”而不是“旅游城市”。然后再想和游客们一起分享市民们的休闲资源。

考虑到未来,黄先生懂得在中国最低支付的工厂工作将最终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国不是它们的最终目的地。计划必须得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所制定,他们对工作条件和工作之余的休闲时间有着更高的期望。所有的工人逐渐成为知识工人,他们想要利用他们的知识,并需要一个激励的休闲环境来帮助他们成为更加丰富和好学的人。

贯穿此书,表达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理解——休闲对于中国的经济和国人的福利都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国内生产总值对于进步不是充分的评估手段。黄巧灵想象的跳跃正开始在诸如杭州等城市被认识到,在那里,丰富多彩的休闲机遇吸引着职业人口和游客们。他对城市的分析,在休闲基础设施的发展中他发挥着核心的作用,解释了为什么成功的工作和成功的休闲走在一起。他的观察对美国也同样有效,在美国,拥有最高生活质量和最佳休闲基础设施的城市吸引着最好和最多的技术工人。他

的对于中国城市中休闲质量等级体系的构想是非常合理的——并将同时增加工作生活的质量。

低技能的工作将继续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进程——通常寻找最低的人力成本。为了对未来作实际的准备，中国必须展望一个时间，在那时所有工人需要更多的技能，更多的学习和更多有意义的休闲。成功的人类在日益显现的世界里将更加丰富和更加机敏。机敏意味着面对不可预见的变化从众多选项中做出反应的能力。休闲的增加，为它用途作的准备，能通向这样的丰富性和机敏性。

休闲，在现代世界，从单纯的对工作调节的寻求延伸到了对快乐的意义和理解的寻求。正当中国人民寻求着去理解他们自身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商业的全球化意味着这样的理解必须被延伸（这对于美国来说同样重要，美国国民常常对世界的其他部分毫无所知）。

当然，中国有选择性地采用西方的休闲方式是重要的。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有着一段令人自豪的文明的古国。它必须找到自身的类型和休闲的用途。这意味着对于休闲的用途必须要有更多的教育。美国并不是为中国充当一个榜样，日本也不是。中国得制造自身的榜样并更新自身的休闲。黄巧灵的书对此很有帮助。

杰弗瑞·戈比

杰弗瑞·戈比简介

曾任总统休闲顾问，美国国家休闲研究院主席。

目 录

上篇 理论和基础篇

第 1 章	四天工作制:全面小康的“绿色通道”	3
第 2 章	四天工作制的“国际惯例和历史惯性”	22
第 3 章	四天工作制合不合中国国情	34
第 4 章	科学发展观催生四天工作制	47
第 5 章	就业:四天工作制的第一贡献	67
第 6 章	四天工作制的突破口在哪里	80
第 7 章	休闲:中国繁荣安宁的必由之路	93
第 8 章	休闲中国的展望和预测	113

下篇 实践和应用篇

第 9 章	旅游:因休闲而变	125
-------	----------------	-----

第 10 章	从昆明的尴尬说起	137
第 11 章	休闲指数:城市的终极竞争力.....	151
第 12 章	休闲杭州的中国标本	165
第 13 章	休闲助推中国产业升级	186
第 14 章	文化产业的休闲本质	206
第 15 章	休闲人居,休闲中国的龙头.....	218
第 16 章	我的实践和探索——休博园:休闲时代的中国 地标	232
后记	251

上 篇

理论和基础篇

第 1 章 四天工作制 :全面 小康的‘绿色通道’

改革进入纵深地带的中国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正面临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资源日益枯竭、环境容量难以承载、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不强,劳动者素质不高,就业压力持续升高;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最终消费率不足;与此同时伴随着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别的加大,影响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黄赌毒”等腐朽堕落的社会文化现象流行。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难题,如何有效地加以解决,建立低消耗可循环的经济模式,正在考验我们的决心和智慧。

在中国,引导健康积极的休闲娱乐方式,建立健全有竞争力的休闲经济体系,营造有利于休闲产业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不仅关系到休闲经济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更关系到公民人格的完善、民族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其中四天工作制是推动休闲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最为有效的政策工具之一。实行四天工作制,首要的功能就是其对促进就业的巨大贡献,它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提升产业结构,同时,四天

工作制在减少犯罪、保持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一定程度上消除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等方面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

综上所述,四天工作制及其引爆的休闲经济是中国现实国情下的一个战略性思考,因为四天工作制及其休闲经济对中国来说,有着比西方国家更多的超越产业本身的现实意义。

A/休闲的缺位:我们到底是“忙”、“盲”还是“茫”?

《中国青年报》数年前,对中国人8小时工作时间之外的生活情况作了一项调查,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3000份反馈数据表明,与1997年相同调查的结果相比,人们每周工作时间明显增加,业余时间明显减少,或者说休闲时间减少。与1997年相比,人们每周工作时间平均增加了2小时,达到48.3小时(1997年为46.2小时);业余时间平均减少4小时,为47.3小时(1997年为51.6小时);睡眠时间比较稳定,保持在54小时左右。

北京市统计局也进行过有关劳动时间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就业人口平均一周工作5.9天,超过了国家规定的一周5天工作日。从调查结果来看,只有不到4%的人一周工作时间不到5天,45%的人一周工作5天,有44%的人一周工作7天。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餐饮业的工作时间较长,这些行业超过60%的劳动者一周工作7天。其中排在前两位的是采掘业和建筑业,分别为6.4和6.3天。

多年以前,张艾嘉唱出的一曲《忙与盲》,于简单平实中道尽了都市职业女性上紧发条般胶着无序的工作状态,这也正是现

代人真实的写照,然而有多少人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忙”究竟是“盲”还是“茫”?

工作负荷、职业危机就像无形的大山压在上班族的头顶,调查表明中国人承受的工作压力普遍过大。知名的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发布的《2003年白领工作压力研究报告》显示,41.1%的北京白领们正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61.4%的白领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心理疲劳;同年8月,上海交大人力资源所的一项调查称,50.8%的女职工与49.2%的男职工压力过大;同年9月,香港专业教育协会的调查发现,63%以上的教师压力较大,而10.76%的教师甚至感到了极大的压力……

高紧张度工作等于是变相增加工作时间: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下,世界各国的许多公司普遍地通过各种管理手段,强化员工的工作节奏和紧张程度,高密度地利用人们的工作时间。变相增加工作时间也意味着休闲质量的降低。

B/工时膨胀把我们变成“机器人”

工作时间膨胀被视为现代生活的逆流,长时间的劳动将直接导致产业灾害频仍,出现过劳死、加重慢性疲劳和精神压力、家庭生活疲惫不堪、丧失自我开发机会、劳动效率低下等各种副作用。而且,依赖延长劳动时间获得产出,将阻碍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转化,并影响就业人员自身素质和就业竞争力的提高,它将人变成为“与机器竞争的工具”。

2000年10月,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调查报告指出:全球患忧郁症的约有3.4亿人,每年约有80万精神疾病患者死于自

杀,工业化国家的劳动者中约有 1/10 的人患有忧郁症、焦虑、紧张、冷漠等精神性疾病。在美国,大约 8 000 万人有心理缺陷。在中国,各种精神病患者也有 1 600 多万人。德国有 7% 的劳动者因精神性疾病而提前退休。3/10 的英国工薪阶层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性疾病。在日本,有近 1/5 的国民失眠。

以上数字反映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全球出现了普遍性的身体与精神健康危机,而上述国家正是经济比较活跃、竞争比较激烈的国家。

导致“人变成了与机器竞争的工具”的原因很多,其中不可否认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长的工作时间,包括周、日工作时间,这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它直接影响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众所周知,睡眠不足、不吃早餐、食用快餐、缺乏运动、紧张是现代社会的流行病——慢性综合疲劳、注意力不集中、缺乏耐心、易怒、秃顶、糖尿病、高血压、失眠、胃病、多梦、肥胖等等最主要的发病原因。过长的工作时间,正在普遍地严重摧残现代人的身体和精神。台湾已有三分之一的男人秃顶。美国成年人中肥胖症患者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给人们充足的时间放松精神、释放压力、就餐、睡眠和锻炼身体是解决这些现代社会流行病最根本的办法。

而在我国,“工作不像工作,休闲不像休闲”的灰色状态尤其令人担忧,因为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掺了水的”。既影响了工作效率,也影响了休闲质量。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职场人士的自我主观评价偏低。

2004 年,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发布国内第一份《中国“工作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报告表明,中国职场人士总体工作幸福

感偏低。

在此次调查中,总共有 5 350 位在职人士填写了问卷,他们就自身的工作幸福程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次调查涉及了 IT、医疗、房地产、物流、金融、政府机关等多个行业。

根据调查系统的设定,报告将“工作幸福指数”的最高值设为 5,最低值设为 0。根据统计分析,此次调查的中国在职人士总体“工作幸福指数”为 2.57,处于中等偏下状态。

从调查结果来看,有近三成的被调查者的工作幸福感偏低,而仅有一成的被调查者的工作幸福感较高。中国在职人士的工作幸福感偏低,值得政府、企业和在职人士的进一步关注。

C/现代社会竞争正在变成财富“军备竞赛”

这样的一个对话相信每一个人都想到过:

A 你这么辛苦地工作是为了什么?

B 为了多赚钱。

A 多赚钱又是为了什么?

B 为了过上好日子。

大多数人的思维就到这里戛然而止,他们并没有往下面思考更多:多赚钱就一定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吗?

事实并非如此,传统经济学认为,增加人们的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最有效手段。但“幸福学”的创立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中心主任奚恺元教授认为,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很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举个例子,在过去的

几十年中,美国的人均 GDP 翻了几番,但是许多研究发现,人们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压力反而增加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们耗费了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增加了整个社会的财富,但是人们的幸福程度却没有什麼变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增加人们的财富,这是可以客观度量的,而幸福学正是站在传统经济学的对面,研究的却是主观无形的“体验”,这正是休闲经济的成果。休闲经济以人的自我开发为过程,发展休闲经济的最终目标不是财富最大化,而是人们的幸福最大化。

另一位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教授黄有光也异曲同工地提出“幸福鸿沟”(Happiness Gap,或译快乐鸿沟)的概念,他在广受好评的《东亚快乐鸿沟》一文中指出:“总体而言,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 2%。”

美国、澳大利亚都是国民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到美国这个程度,继续增加财富与带来国民幸福的关系越来越小,那么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情况是不是也一样呢?

研究结果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联度很紧密;但当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它对幸福的影响就不如先前那样大了,而决定幸福的其他因素相对来说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起来。这个临界点,一般认为是人均 GDP 3 000 美元。在中国,达到这一水平线的地区已经很多。

换句话说,基本的物质财富对于幸福是很重要的,但在这种

基本要求满足之后,财富与幸福之间就没有了正的线性关系。

从个体角度而言,这个特点仍然存在。缺乏基本的舒适生活条件的人,幸福感的体验往往较低;而在“衣食足”的人群中,财富的多寡,与主观幸福体验的关系却很微弱。或者说,在达到舒适、温饱之后,财富的增加所带来的幸福感会越来越弱。极少数巨富的人群的幸福感,仅仅比一般人口稍高一点,而他们的财富却远远超越普通人群,财富和幸福感不成比例。事实上,超级富翁的一个共识是,“金钱可以增强,也可以削弱幸福感,取决于如何使用财富”。

关于财富与幸福这两个现代最基本的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辅相成或者此消彼长那么简单。概括地说,两者的关系是:

——人们往往高估钱的重要性。许多人以为钱多会使他们更幸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人们选择的东西,并不是最能使其幸福的,人们自主作出的决策并非最佳的,很多时候人们都会预测错误。

——除了钱之外,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增加快乐。

财富和幸福的关系也许可以这样描述:并不是说你的钱比以前多,就会得到相应的幸福感。你只有比别人的钱更多,你才能得到钱带来的幸福感,哪怕这个钱多到你根本就用不了。而你为了挣到比别人更多的钱,只能永无止境地拼命努力。结果就陷入到一场没有赢家的财富“军备竞赛”之中,最后得到的只是疲惫和疾病。

D/市民对闲暇生活方式满意度仅为 44.27 分

工作压力不仅仅是上班时候的烦恼,伴随工作压力、就业竞